

參閱文稿

北京華研有限公司
(香港) 桑尼研究公司

No. 2019~15

2019 年 11 月 4 日

百年人物存公论 —— 追忆外公林济波早年革命经历

中信集团 杨林

时光荏苒，外公离开我们已经 50 年了。在我少年时的记忆中，外公是一位慈祥、严谨、博学的老人，侨居菲律宾多年，办了大半辈子教育，回国后赶上“文革”，受到造反派批斗和关押。外公去世前，我回福建老家与他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他平日极少提及旧事，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家里长辈们对外公的经历也是讳莫如深。“文革”后纠正冤假错案，外公的诬名终于在他离世十多年后得以洗清，外婆、母亲和舅舅们才会不时谈起外公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这时我渐渐知道，外公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福建同安最早的一批地下党员，年轻时有过一段出生入死、毁家纾难的革命经历，斗争失败后与组

织失去联系，只身远下南洋。随着平反，福建地方党史研究和老同志的回忆文章中出现了有关外公的一些记述。可惜当年环境所迫，老人留下的大量资料都被销毁。有关他的“黑材料”，组织部门在平反时也当着家人的面烧掉了。许多年后，我从家里的故纸堆中意外发现了外公“文革”中所写自述材料的一大摞草稿，竟有数万字之多。那些写在泛黄的纸上的文字密密麻麻，虽然显得支离破碎，却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为后人了解这段历史提供了难得的线索和独一无二的细节。

一

外公原名林得恩，字竹音，参加革命后改名林济波，取承续革命浩荡洪波之意。他自认是一个文士气很重的人。因为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为掩护身份，频繁改名习以为常。“文革”中写交代材料，他列出用过的名字竟有 20 多个。

外公于清光绪 32 年（1906 年）10 月出生在福建漳浦北门兜的一个平民家庭，父亲叫林润福，母亲陈端早逝，据说祖上从海南岛乘船漂流至漳浦六鳌，倍受当地豪绅和族中强房的欺凌。年少时因为交不起学费，读书时断时续，18 岁才从云霄的浚源小学毕业。为了继续求学，他于 1924 年瞒着父亲跑到厦门，考上集美学校师范部，开学时却赶上漳厦护军使臧致平与孙传芳的部队在同安一带激战，造成交通中断，无法如期报到，次年重新投考被插班录取。

集美学校是由著名爱国华侨实业家陈嘉庚先生创办的。嘉庚先生所持“教育为立国之本，兴学乃国民天职”的思想，对外公一生影响至深。校方对他这样的穷学生极为优待，学费和课本、讲义、食宿等费用均免，连被席蚊帐和每年春冬两季制服也由学校供给。学校规定，如果每日三

餐都吃稀饭，还可以得到每月两元的津贴。节省下来的钱，除去购买肥皂牙膏之类的东西，外公大都用来订阅《创造》《向导》《中国青年》《幻洲》等进步刊物了。

集美学校讲究的是“旧榘新梨，兼收并蓄”的开明办学，师生思想十分活跃，为年轻人接触新思想、学习新知识、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创造了很好的场所。施之勉、蔡斗垣、陈问涛等进步教师公开在课堂上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对外公产生了很强的吸引力。他写的作文已带有浓厚的社会平等、教育救国色彩。外公在课外还大量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少年中国》《独秀演讲集》《工人流血记》等书籍。正是在这里，一个从穷乡僻壤走出来的年轻人，如饥似渴般地完成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启蒙。

根据外公所写自述材料，他是 1925 年在集美师范读书时开始接触共产党的。外公的同学罗扬才、李觉民等在厦门大学建立起福建历史上第一个中共支部，集美师范也成立了由罗贤开任书记的第一个党团合一的支部。直接吸引和影响外公走上革命道路的，正是集美师范的那些进步同学。他们虽然当时都很年轻，却是福建最早的一批革命活动家，以后成为各级党组织的创始人，其中有后来的福建省委书记罗明、宣传部长邱泮林、组织部长谢景德、闽西特委书记郭滴人、厦门市委书记刘端生以及翁泽生、杨世宁、朱为满、洪宗涂、彭再添等许多福建党史上的知名人物。外公不但在与这些同学的交往中得到耳濡目染，有些在其后的革命斗争中更成为关系密切的战友和上下级。在那个年代里，集美师范因为走出了一批年轻的共产党人而被称作“革命摇篮”。

在集美师范读书的几年中，外公常常和过从甚密的几位同学邹鲁、林汉杰、刘琼瑶、何长明一起，晚上跑到集美海边的鹅头宫参加聚会。这种聚会虽是地下秘密进行，参加者却有四五十人之多。他们讨论最热

烈的话题就是如何学习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成功经验，反对军阀割据，改变中国现实的社会不公。每年寒暑假，外公回到老家，还会把他在学校听到的新思想传播给云霄浚源小学的同窗密友陈元宰。被外公唤作“慧仔”的陈元宰追求进步十分强烈。听到外公的宣传，便急切地希望参加革命。于是，外公帮助他和女友一起化妆离家，黄昏时乘船取道东山，由汕头辗转厦门，从此走上革命道路。几年后外公主持中共同安县委工作时，陈元宰已是厦门市委书记了。

在校期间，外公积极参加学生自治会组织的国耻日大游行、声援五卅运动、抗议“沙基惨案”、迎接北伐军等一系列爱国活动。1926年11月，北伐军代表来集美学校演讲，学生们所拟《校务革新会章程草案》被校长叶渊所拒。校方做出一系列限制学生的规定，引发了震动全国教育界的集美学校“驱叶”风潮。外公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对校长强令解散学生组织的做法很是不满，参加了罢课委员会与校方的谈判斗争。这时，正在厦门大学任教的鲁迅先生受邀来集美学校演讲，鼓励学生“留心世事”，树立“进取精神”。鲁迅先生所说“聪明人”不能做事、“世界是靠傻子来支持”的话，令外公和在场的同学都深受触动，校长叶渊则坐在一旁连连摇头。这场风潮延攘数月，最后在蔡元培、马叙伦先生亲自出面调解下才告平息。

1927年年初，随着北伐军东路军入闽，厦门、同安地区的革命斗争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因为熟悉闽南情况，已担任中共汕头市委书记的罗明被上级派回福建，负责组建闽南地方组织。他与外公是老同学见面，分外亲热，加上政治见解一致，对外公非常信任，时常来外公的住地做彻夜长谈，晚了便挤在一起睡。外公由他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闽南党组织建立后最早的一批党员。这时外公刚刚二十出头。

这一年，外公由集美学校师范部第17组毕业。陈嘉庚先生鼓励他

们这些师范生到乡村办学教书，改变闽南农村文化落后的面貌。经学校教育推广部介绍，他被安排到同安东区长兴小学担任教师。

二

1927年春天，形势急转直下。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三天，厦门海军警备司令林国赓和国民党厦门党部筹备处主任李汉青发动“四九”事变，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受到通缉，担任厦门总工会领导人的罗扬才、杨世宁被捕，转押福州后英勇就义。同月，同安的国民党右派也发动了“四二九”事变，召开“拥蒋护党”大会，疯狂捕杀共产党人，与外公相熟的洪天锡、洪学湍等一大批党员被捕后遭杀害。正如后来闽南临时特委给中央的报告中所说，“自经四月间变乱，后一再之摧残后，A，负责活动同志被捕杀。B，负责同志在漳厦站不住。C，一般知识分子逃散。D，工人同志被捕者被捕，被驱逐者驱逐，工人支部崩散。”耳闻目睹一个个凶讯，外公十分悲愤，因为这些被捕和牺牲的同志中，很多都是集美师范的同学。

革命斗争转入低潮，中共闽南部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城市党组织进入秘密状态，把工作重点向农村转移。在农村担任教师的党员以身份为掩护，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中坚持地下工作，是这个时期同安革命斗争的一个突出特点。外公白天在学校教书，晚上便躲在屋子里刻写蜡版、油印标语。从同安到马巷的电线杆上，经常一夜之间就贴满了外公油印的标语和传单，令敌人极为恼火，反复在各个学校突击搜查，却并无所获。

大革命失败后，闽南农村的社会矛盾日渐尖锐，贪官污吏横征暴敛，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使农民的反抗情绪达到顶点。外公向党组织提

出，应该把工作重点放在抗苛捐杂税上，这是最有利于争取群众的斗争形式。由他和朱为满、林汉杰共同发起组织了同安东区农民抗捐抗税斗争，参加者声势浩大，有上万之众。不久，11军26师丢失枪支，怀疑到外公和集美小学校长朱亦伟头上，将二人抓到漳州，又转押汕头，三个月后查无实据才被释放。

1929年夏天，外公将一份名为《中国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刊物包上《国民党党务月刊》的封面，在教师中传看，被当时他任教的禾山殿前小学校长发现后辞退。于是，党组织通过集美学校教育推广部，派他去马巷镇洪溪村的仑头担任新伦学校校长。他在这里建立了中共同安临时县委下的第一个党支部，即新伦学校支部，并担任支部书记，先后安排共产党员王洪范、张宝琛、王云萍来新伦学校工作，使这所学校成为地下党在闽南地区的重要交通站。正是这时，外公见到了从海澄师范毕业后来新伦任教的外婆王珍舟。她是王云萍的堂侄女，思想进步，同情革命。二人一见钟情，不久便喜结连理。那一年外公24岁，外婆才17岁。

为了更好地在农村发展革命力量，中共同安县委提出，依托集美学校的影响，把乡下众多私塾分批改造成新式学校。这项工作很自然地由那些担任教师的共产党员承担起来。外公在同安农村组织革命活动时，积极宣传私塾改办学校的好处，受到群众欢迎。由于这笔办学经费全部由集美学校承担，学生实行免费入学，许多家庭贫困的穷孩子因此有了上学的可能。借此机会，一批党的干部被安插进学校，以教书为掩护开展工作。同安县的牯民、道南、官山、许厝等学校，都是外公他们以私塾改造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外婆娘家所在的珩厝村，有一家由锦丰派头面人物王德成创办的私塾，外公与村里的党员王庶民、王丛生一起，三番五次上门做他的思想工作，终于说服王德成同意将私塾改为珩江小

学，并在此建立起中共同安县委的领导据点，具体位置就在外婆家门口正对的王氏祖祠。当时的县委书记张益坚和县委委员许英宗、邹鲁三人全都在此任教。党史资料记载，中共同安县委、共青团同安县委两个县级领导机关同时设在这里。1929年夏天，中共福建省委召开党团活动分子会议，地点也选在珩江小学。他们还组织学校的师生编写文明戏剧本，抨击地主恶霸的剥削压迫和农村的封建陋习，在周边乡村宣传演出，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

外公担任新伦学校校长期间，福建省委、厦门市委领导人往来落脚十分频繁，食宿都在家中。省委书记罗明每两三个月来一次，简直就像家人一样。与外公关系密切的省委组织部长谢景德、省委秘书长陶铸也是家中常客。当时担任省委组织干事的陈元宰找到外公，希望建立一条秘密交通线，外公负责其中一段，为省委通往中央苏区提供依托，主要是承担红军和苏区领导人往来掩护和接待的任务。红四军前委书记陈毅去上海开会，红20军军长左权从苏联回国进入闽西根据地，都是取道厦门同安，由陈元宰带到外公处安排落脚休息。更多的往来人外公并不认识，常由省委交通员张水曜带来，姓名也不知道，或是吃一顿饭睡一觉就走，或是留滞数周悄然离开。外婆形容家里成了“人来人往的客店”。外公每月的收入几乎都用到接待工作上，不但薪水全部花光，连结婚时打的金戒指也拿出来捐给了组织。那时候，许多革命者并无公开身份，也没有什么正经工作和收入，生活费用的来源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1930年春天，外公担任同安县委委员时，同为小学校长的县委委员张世纶对外公说：“济波，现在同志间就是你和我的薪金收入最多了，你我二人都要多负担些。”外公回答：“为了革命，没有问题！”这段情节，外公在“文革”中写交代材料时还多次提起。其时，他的父亲和胞弟林得裕在老家先后病倒，急需用钱，但外公的薪金都用来闹革命了，

并没有钱去接济他们。父亲和弟弟在重病中先后离世，外公也没有能赶回去见最后一面，内心的自责一直到晚年都很强烈。

那段时间，闽南地区白色恐怖十分严重，外公常常需要根据上级的要求，冒着生命危险往来运送武器，一次，地下党组织对厦门国民党的一个特务头子搞刺杀行动，外公将驳克枪藏在大大的一只陈嘉庚公司的饼干桶内带到岛上，先将联络密信放在基督教青年会公共阅报室的报栏内，约好接头地点，对上联络暗号，与行动队员交接武器，执行完任务后，再由外公将枪支带出厦门。这类行动十分危险，但外公并无犹豫和退缩，总是想方设法完成好任务。

三

1930年5月，中共福建省委领导了震惊中外的厦门大劫狱，外公直接参加了这一斗争，并为劫狱的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

2、3月间，厦门地下党和闽西根据地一批重要干部被国民党逮捕，关押在厦门岛南部的思明监狱中，其中就有外公在集美师范的同学、中共厦门市委书记刘端生，还有厦门大学学生领袖、共产党员张耕陶等，一共40多人。外公听说这批政治犯并不提审，准备押解福州处决。这不能不令他为老同学的安危万分担心。

为了尽快营救这批革命同志，福建省委作出了实施劫狱的重大决定，成立了由省委书记罗明、省委组织部长谢景德、省委军委书记王海萍、团省委书记王德和时任军委秘书陶铸组成的破狱委员会，下设行动队和接应队，分别由陶铸和谢景德负责。考虑到厦门敌人的兵力设置和思明监狱的枪支配备，劫狱首先需要解决自身的武器来源问题。罗明找到外公，请他回漳浦老家购买手枪。漳浦民风强悍，由于连年战乱，民

间私藏武器者不少，但携带枪支很难躲过沿途检查。外公遂以回乡扫墓为名，与新婚的妻子一起潜回漳浦，通过朋友关系，从张贞部队的一个军官手中买下两把驳克枪。如何才能将这两把枪安全带回厦门，外公想来想去，跑到商店里买了一对制作精致的皮枕头，把两把枪分别藏入皮枕芯内，由他和外婆二人随身携带，竟然成功躲过一路的关卡盘查。考虑到年轻女子一般不会被人怀疑，这两把枪最后由外婆按照省委的接头安排，送到厦门思明东路尾的联络点，交给一位叫秀明的女交通员，由她转交给负责劫狱行动队的陶铸同志。

讨论破狱方案时，对狱中同志的撤离方向产生了不同意见。有人提出撤往厦门港对岸的海澄，或是从嵩屿进入内地，但估计国民党的追兵围捕不易摆脱，很难保证安全。破狱委员会考虑再三，决定把撤离地点选在同安，主要是考虑狱中的同志大多来自闽西，撤往同安是敌人很难预料到的。如何确定同安的具体安置地点，罗明与负责接应队的谢景德专门将外公和同安县委委员许英宗约到厦门商量。许英宗认为，彭厝的农会力量比较强，有一个和安堂药店可供隐藏。外公则主张将撤离地点选在外婆家所在的珩厝，因为这里一直是同安特支和县委的基点村，党团员比较多，他十分熟悉村里的情况。于是，罗明、谢景德等几位同志专程来到同安，由外公和许英宗陪同，对珩厝和彭厝进行了实地考察，最后确定这两个村为劫狱后的人员临时安置点。外公还特意去了一趟大嶝岛，联系到谢石水的一艘二百担帆船，与彭厝彭宏概的帆船一起执行人员从厦门撤离的任务。

5月25日上午9时，劫狱战斗开始。罗明、王海萍在太古码头后的琼州会馆坐镇指挥，王德带领10人在周边路段负责观风、报讯和阻碍增援的敌人，谢景德率接应队员扮装成游客准备接应。陶铸及11位行动队员以探监为名，分批进入思明监狱。他们击毙了副看守长卢永忠、

警卫队长吴广成等六名企图抵抗的敌人，用一把大老虎钳剪断牢房铁锁，前后仅用 10 分钟时间，便完成了营救全部 40 余位狱中战友的任务，而我方无一损失。此时，外公和许英宗带领的两艘帆船早已等候在碧山路打石字码头，获救人员一登船，便迅速向港外西北方向驶去。为了避人耳目，两艘船在穿过高岭集美海峡后，并未急于开往目的地，故意在海面上转来转去，造成一种捕鱼的假象，直到入夜后才分别靠岸。一路上，无论获救的同志还是营救人员，都难掩逃离虎穴的激动和兴奋。刘端生紧紧拉着外公的手说：“这次死里逃生，多亏了省委和同志们，也多亏了老同学！”

按照事前的安排，17 位脱险的同志由许英宗带往彭厝，其余 20 多位则由外公带到十几里外的珩厝。船停驶在珩厝白头官边的大仙石下，大部分同志住到珩江小学所在的王氏祖祠，小部分住在与外公熟识的老党员王琼树家。他家里是两进的大屋，有一只硕大的灶台，承担了给二三十人做饭的任务。

第二天，省委要求全部脱险人员到珩江小学集中，罗明、谢景德、王德等领导赶来看望和慰问出狱的同志，并代表省委为他们重新分配工作。考虑到革命斗争的需要和安全问题，这些同志在珩厝稍事隐蔽休息后，大部分都由外公具体安排转赴闽西根据地，为党领导的土地革命输送了一批重要骨干。

同安县委和外公在“五二五”劫狱斗争中做出的贡献，得到了省委书记罗明的表扬。

厦门大劫狱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城市斗争的一次重要事件，它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中打击了国民党的统治和气焰，犹如沉沉暗夜中的一道闪电，给受压迫者的斗争意志以极大鼓舞。厦门军警当局为此被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陈果夫发电痛责，受到南京行政院的严厉处罚。这段历史

后来由同安籍作家高云览写成长篇小说《小城春秋》，并拍成电影，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彪炳史册的革命斗争经典和红色记忆。

外公曾经引为自豪的这段经历，后来竟不断出现难以想象的颠覆。劫狱的重要领导人陶铸事后被当时的中央认为与李立三路线有直接关系，受牵连调离省委。获救的同志在闽西根据地碰上肃反扩大化，刘端生、张耕陶被诬为“托派”遭错杀。30多年后的“文革”中，陶铸更成为全国“第三号走资派”，从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的高位上被打倒，劫狱斗争被“四人帮”污蔑为机会主义路线的产物。一次，外公在报纸上看到整版批判陶铸和《小城春秋》的文章，对罗明等劫狱领导人也点了名，他数日长叹不已。因为这也是对他早年革命生涯泼上的脏水，对外公这样一位老人来说，那种内心的苦楚和不甘确实难以名状。

四

1930年后，闽南革命斗争的形势更趋严酷，国民党右派势力在加强军事进攻的同时，使用各种手段对共产党组织进行破坏。中共福建省委机关一批重要干部被捕遇害，同安县委和特支前后几位主要负责人朱为满、李南金、周少梁等相继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下，许多党员骨干在与组织失散后外逃求生。和外公一起参加“五二五”劫狱斗争的县委委员许英宗仅两个月后就在厦门厦港渔行口广场被国民党杀害。外公还听说调往漳州工作的陶铸同志出家为僧了，过了好一阵才打听到，其实是他化装成和尚，躲在丹霞山下的南山寺里。

由于敌人的围剿和捕杀，同安党的工作几度陷于停顿，福建省委多次派人到同安重建组织，但有时才几个月时间便又遭破坏，可谓屡散屡

建。1930年夏天，福建省委书记罗明来到同安，宣布由外公担任同安县委代理书记，要求县委采取分散活动的形式开展工作，努力保存革命力量，在坚持斗争的同时注意避免损失。他担任县委主要领导人，一直持续到福建省临委派吴菊侗和林汉杰来同安改组县委。此后，外公改任县委委员、宣传部长。外公在“文革”中曾回忆说，那时党的组织并不像后来那样严密，他这个县委代理书记是罗明“口封”，实际上并没有一套严格的组织系统；由于地下斗争环境的限制，党内同志之间常常并不知晓，也没有人会去计较地位和职务。但后来王明、博古在党内大搞反“罗明路线”斗争，一大批干部被撤职，外公确实感到非常不解，他与这位老同学从此再没有见过面。

1931年初，与外公一直保持密切联系的漳属特行委书记陈元宰被捕，外公对他的安危非常担心，多方托人打探情况，得知他化名林有龙，已被敌人认定为“共产党要犯”，遭受了严刑拷打。由于身份暴露，他被判刑15年后转押福州第一监狱。外公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想方设法筹措资金，在省委统一组织下，以亲友身份开展营救工作。但直到两年后19路军在福州发动“闽变”反蒋，为营救工作带来转机，陈元宰等一批政治犯才终于获救出狱。

“闽变”也为同安农民运动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契机。根据厦门中心市委的指示，同安县委决定深入发动群众，开展一系列反恶除暴斗争。外公和周少梁、彭德清、陈先查等人一起领导了这一时期的斗争，如攻打国民党马巷契税局，处决了老百姓恨之入骨的契税局长陈遥远；组织群众在珩厝抢分国民党保长、地头蛇王德桥的盐坨；在后村抢分当地土豪郭铃亮的顺胜布店；为解决粮荒，还袭击了新圩富商陈喹铿的源隆米店。这些行动打击了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但也暴露了目标，敌人为此疯狂反扑，一年内三次对县委所在地的山后亭村发动“围剿”。县委领

领导人陈先查被敌人堵在家中，突围时中弹牺牲。被外公称为“最会打仗”的彭德清，也是被捕后从同安监狱越狱逃脱的。在敌人对同安县委机关的一次突袭中，正赶上外公严重咳血去马巷医院看病，侥幸躲过国民党军队的包围，不得不逃往漳浦，先后在漳浦救济院和民教馆躲避。同安县党组织再次遭受严重破坏，革命事业转入持续低潮。

1936年，厦门中心市委书记余南被敌人包围后失踪，中心市委解体，新建的厦门临时工委找到外公，让他放下手里的工作，打入国民党政府内部开展隐蔽战线斗争。这是一项新的任务，之所以这样安排，既是当时对敌斗争的需要，同时考虑到同安县主要干部大都暴露了政治倾向，只有外公多年来一直对外保持着学校校长的身份，尚未引起敌人的注意。国民党同安县党部书记长曾文墨也是外公在集美师范高一年级的同学，虽然知道外公读书时对现实不满，但并不了解他在共产党组织内部的身份，于是要求外公具结保证不参加共产党的活动，介绍他去福州西湖投考福建省县政人员训练所第二期督学班。经过考试，外公以第三名被录取。此后，他先后在连城、龙岩、平和担任县督学，后又转至云霄、安溪担任县教育局长。进入国民党政府机关后，外公按照地下工作要求，与上级党组织保持单线联系，秘密开展联络、策应和传递情报、救助被捕同志等工作。经他精心安排，出狱后重病在身的陈元宰隐藏在云霄县白塔乡。那时卫生条件差，外婆突然传染上脑膜炎，长时间卧病在床，无法再教书了，家中十分拮据。但外公还是想方设法为陈元宰提供了治病和生活的费用。陈元宰不幸病逝后，外公又以教育局长的身份，将他的妻子、原中共连江县委妇女部长缪淑英安排到云霄浯田小学任教，缪淑英被国民党保安队逮捕，也是外公出面担保获释的。

1939年后，闽南地下党交通系统再遭敌人重创，外公与上级无法取得联系，从此与党组织的关系完全中断。他十分焦虑，四处寻找无果，

自己却引起了云霄 CC 特务头子张廷芳的怀疑，一度还被免去职务，调出政府机关。眼看身份暴露的危险与日俱增，他被迫决定去南洋躲避。闽南是侨乡，民间与海外有很多联系渠道，党组织被打散后，相当多干部都会选择出国流亡，这是闽南地下党躲避白色恐怖的一个特点。外公的领导和战友彭友圃、洪宗涂、唐沙白、张世纶等许多人都是流亡海外，才躲过了敌人的追捕。但外公一直有这样的信条，无论面对何种情况，绝不出卖同志，也不曾暴露任何组织机密。甚至“文革”中他对造反派说，党的秘密我连你们也不会说。这是他所信守的做人的清白。

为了不引起怀疑，外公对安溪县县长王道纯谎称回云霄接取家眷，只身乘夜逃离险境。他匆匆告别云霄的家人，经集美师范的同学张时雍安排，取道广州、香港来到菲律宾。海外流亡，前路未卜，为了求生不得不痛别妻儿老小，外公的心情不难想见。他后来在菲律宾写下一首《漳江忆别》的诗，真实记录了去国时的境况：

滔滔漳水从云霄流向东南，
遇着海潮逆转回涨。
江边许多船只把帆儿挂上，
要撑着退潮开到临县东山，
那是一个黄昏后月色朦胧的时间。
游子刚要步出家门的晚上，
儿女们低头沉思默不发言。
病妻倚杖坐在床前，
她已哭红了泪眼。
游子用手遮面疾步而出，
心头已像穿透了一把利剑。
……

在菲律宾，外公先在描戈律的大同小学任教，后辗转于亚巴里、迺乙、巴亚里安、描丝兰等地，担任过六所华人学校校长。虽然很快就融入当地生活，但他一直不肯加入菲律宾国籍，保留着有朝一日重回祖国的心愿。菲律宾华侨中有一个国民党组织的头目叫柯俊雄，到处散布说外公有赤色嫌疑，给外公办学找了不少麻烦。

与家人天各一方，思乡之苦尤甚。但能够教华人子弟学习中国文化，为困顿中的外公带来了希望和愉悦，没想到这一干竟是那么长的时间。

五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鼓励海外华侨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国家专门成立了由廖承志担任主任的接待和安置归国华侨委员会，要求妥善安置归侨的工作，甚至规定归侨带回的行李物品一律免收关税。那时菲律宾与中国没有外交关系，外公靠每晚收听广播了解祖国的情况。他还一直细心地保存着母亲寄给他的一份《国务院关于接待和安置归国华侨的指示》，在一些重要文字下面用笔划上了横线。看到与他相熟的陶铸同志也是这个接待安置委员会的副主任，外公更增加了内心的期待，最终决定放弃在菲律宾的全部积蓄和财产，于1960年通过中国旅行社安排经香港回国。与祖国和家人久别的他重新踏上了这片曾经十分熟悉的土地。

外公是个多才多学的人，除了热心基础教育事业、精通英文外，对于古文字学、音韵学、中医、历法、篆刻都有很深的研究。当时内地在搞汉语拼音化运动，外公渴望为国家和社会效力，自己花了很长时间设计出一套汉语拼音化方案，专门送到国家文字改革委员会。非常可惜的是，外公虽然按照政府要求做了工作登记，但由于年龄原因并未得到安

排，他的许多心愿也未能实现。闲居珩厝乡下期间，外公热心助人，村里人海外关系多，寄往国外的信都由他义务代写英文信封。乡亲们在国外买的药，村里的进口农药和种子，也都是请他把英文说明书翻译成中文。一次，外公去许厝访友，得知牺牲的老战友许英宗后人生活困难无人过问，竟不顾自己的归侨身份打抱起了不平，批评当地领导说，许英宗是同安最早的共产党员，至少你们也要给他家里人一个烈属的身份才对。能为乡亲们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成了外公晚年生活的一大乐趣。

外公一生最大的不幸，是在花甲之年赶上了“文革”内乱。他曾多次躲过国民党的追捕和迫害，却未能逃脱这场意想不到的灾难。“文革”初期，外公就被戴上“叛徒”“特务”和“反革命分子”三顶帽子，遭到无休止的审讯和挂牌游街，被迫从事重体力劳动，非法关押达一年多时间。所谓“反革命罪行”，无非是他对“四人帮”的一些不满言论和几首带有批评意味的旧体诗。比如他说江青鼓动“文攻武卫”是“牝鸡司晨，其国必败”；说路线斗争是“水牛相牴，踏死鲟鳇”。对当年集美师范的同学陈尚友，即后来官至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也多有不敬之语。这些话本来是他与人聊天闲谈时所说，却被揭发出来，成为十恶不赦的大罪，令他百口莫辩。尤其让外公十分伤感的是，连他早年抚养长大、供其读书的一个义子，此时竟也成了“反戈一击”的告密者。严酷的政治迫害，使体弱多病的外公健康状况不断恶化。1969年9月19日，外公在珩厝家中猝然离世，时年63岁，葬于村西北的番石榴园墓地。

扣在外公头上的诸多不实之词，在1973年同安县有关部门复查时即被认定证据不足，不予定性；真正发文平反则是“文革”结束后纠正冤假错案时的事了。母亲一直非常感激珩厝村党总支和参加同安党史资料征集、调查的王福星等人，由于他们的同情、帮助和深入细致的调查

工作，还给了外公这段清白。拿到盖有中共同安县委组织部红色公章的证明材料时，全家人都非常高兴，仿佛搬去了长时间压在胸口的一块巨石。1985年，我帮助母亲与当年的中共同安县委书记、红军安南永德游击队政委彭德清取得了联系。他与外公曾是关系亲密的战友，同在同安县委工作，建国后担任过27军军长、海军东海舰队副司令员，这时已是国家交通部部长了。听了母亲的介绍，彭德清部长非常激动，深情回忆起地下斗争的往事。他宽慰母亲说，“文革”中连我都关了五年，不用说济波了，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他还特别告诉母亲，当年党组织虽然与外公失去了联系，但和外公熟悉的人都没有被敌人抓捕，证明他没有出卖自己的同志，这段历史是清白的；在当时白色恐怖的情况下，这已很难能可贵。在老人退休后撰写的《忆同安越狱斗争》一文中，还特别提到外公。

外公一生坎坷多舛，命运随时代潮流沉浮动荡，年轻时对于革命和进步的追求，可以看作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寻找救国道路的一个缩影，但个中曲折艰辛难以为人所知，被染上一层悲剧色彩和扑朔迷离的味道。虽然不幸蒙冤，但今天观诸《同安县志》《中国共产党同安历史》《中共厦门地方史》，对于外公那段革命经历均有正面记载。我在整理外公自述材料的过程中，检索和查证了许多历史资料，写下这篇文章，算是对老人家的告慰和追思。古人有“百年人物存公论，青史他年有定评”之句，如今放在外公身上，确是再恰当不过。